



打造玛丽·居里:

信息时代的知识产权
与名人文化

MAKING MARIE

CURI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elebrity Culture in an Age
of Information

【瑞典】爱娃·赫蒙斯·沃顿 著
Eva Hemmungs Wirten / 袁锡江 译



打造玛丽·居里：

信息时代的知识产权
与名人文化

MAKING MARIE
CURIE :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elebrity Culture in an Age
of Information

【瑞典】爱娃·赫蒙斯·沃顿 著
Eva Hemmungs Wirten / 袁锡江 译

版权登记号：08-2016-08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打造玛丽·居里：信息时代的知识产权与名人文化 /
(瑞典) 爱娃·赫蒙斯·沃顿 (Eva Hemmungs Wirten) 著;
袁锡江译. --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316-9009-2

I. ①打… II. ①爱… ②袁… III. ①居里夫人(Curie,
Marie 1867-1934) - 传记 IV. ①K835.656.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3753号

Making Marie Curi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td., London © 2015 by Eva Hemmungs Wirten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 2017 by Heilongjiang Educational Press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打造玛丽·居里：信息时代的知识产权与名人文化
DAZAO MALI · JULI: XINXISHIDAI DE ZHISHICHANQUAN YU MINGRENWENHUA

丛书策划 宋舒白
作 者 [瑞典] 爱娃·赫蒙斯·沃顿 (Eva Hemmungs Wirten) 著
译 者 袁锡江 译
责任编辑 彭剑飞
装帧设计 冯军辉
责任校对 赵蔚婷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158号）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longjiaoshe>
公众微信 heilongjiangjiaoyu
天 猫 店 <https://hljjycbts.tmall.com>
E - m a i l heilongjiangjiaoyu@126.com
电 话 010-64187564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17
字 数 180千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6-9009-2
定 价 45.00元

序言

Marie Curie

2009年，欧莱雅公司受《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杂志委托，帮助调查评出“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女性科学家”（*The Most Inspirational Female Scientist of All Time*）。表面上，这项调查似乎不应该由一家化妆品巨头来承担，但当我们了解到是“欧莱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杰出女性科学家成就奖”项目（*L'Oréal UNESCO "For Women in Science"*）^①赞助了这一调查，我就不这样认为了。调查结果如预想一样，玛丽·居里（1867—1934）在角逐中势如破竹，

① 我在本书尽量减少注释的使用。本书“文献综述”部分会详细介绍我所使用的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关于网页、新闻、期刊文章以及国际联盟和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的官方文件，我会在注释中完整注明，本书使用的大量一手资料也遵循这样的处理方法。这些档案被编写为NAF18365-18517（新法国引用格式，法语：Nouvelles acquisitions françaises）。脚注中的参考文献依据的是NAF18450，并在其后加上f.（代表法语单词feuille，表示“页码”），表示在特定文献编号中的页码位置。如无特殊说明，所有法语英译都是由笔者完成。如已存在英语版本，例如《皮埃尔·居里传》和《居里夫人传》两书，我便使用了其英语版本，同时标明了其在原法语文本中的页码，[F]表示法语，[E]表示英语。国际联盟的文件有法语和英语两种语言的文本，我尽量在书中直接使用英文版。参考文献中有关国际联盟文件的简写符号意义如下：A——国联大会；C——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42（a）——会议记录，文件类型；1921——年份；XII——表示知识合作的罗马数字。

《玛丽·居里成为科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女性》（*Marie Curie Tops Poll of Most Inspirational Women in Science*），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新科学家杂志》新闻发布会（UNESCO and New Scientist press release）。2009年7月1日。<http://www.unesco.org.uk/uploads/PR-PollofWomeninScience-1July2009.pdf> [2014年1月10日]

击败了紧随其后的罗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1920—1958），并以高于第二名两倍的票数获胜。居里夫人发现了镭元素，并在后来成功分离了镭。在她与丈夫皮埃尔（Pierre）带给世界的这一新科学领域里，居里创造了“放射性”（radioactivity）这一术语。因此，居里夫人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样，是现代科学界无人不晓的人物。截至目前，只有居里夫人是两度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她在1903年和1911年获得的荣耀将使她永远屹立于科学的奥林匹斯山而不倒。

校园里的孩子们了解到玛丽·居里所取得的成就，懂得了毅力与专注的精神力量会使我们展翅高飞。此番教诲对每一代人来说都很适用：即便是女孩，也只有天空才是我们的极限。无数怀揣实验室梦想的青年人都将这位拥有波兰和法国双重国籍的科学家视作自己的榜样。居里夫人的事业及个人生活一直以来都令人津津乐道，人们需要不断为之作书立传。有关20世纪科学的所有教科书、辞典或浩繁的百科全书里如果没有居里夫人的名字，那它将是不完整的。居里夫人的名声之大还表现在，2015年，法国电视2台（French 2）的观众们在“历史上最伟大的十位法国人”（ten “Greatest Frenchmen of All Time”）的评选排名中，她排在第四位，仅次于戴高乐将军（De Gaulle）、巴斯德（Pasteur）和阿贝·皮埃尔（Abbé Pierre），且排在喜剧演员科鲁彻（Coluche）之前^①。就在距此几年前，居里夫人被誉为最受人尊敬的法国历史人物之一，仅位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国民族英雄让·穆兰（Jean Moulin）和圣女贞德

^① 《戴高乐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法国人》（*De Gaulle plus grand français de tous le temps*），《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2005年4月6日。

(sainte patronne Jeanne D'Arc) 之后^①。

居里夫人备受推崇，令人敬仰，甚至被奉若神明，人们对她性格的赞扬无穷无尽。那么，她对科学的贡献又如何？在这一点上，人们的裁定就没那么多溢美之词了。一位法国的居里夫人传记作家劳伦·勒米尔（Laurent Lemire）指出，居里夫人可能受到了因文化冲突和文化竞争而起的“盎格鲁—撒克逊歧视逻辑”（Anglo-Saxon depreciation logic）的影响^②。根据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所言，和“牛顿时代”“达尔文时代”“弗洛伊德时代”“爱因斯坦时代”或者“凯恩斯时代”这些名词相比，我们从未见到过“居里时代”这样的词^③。不管怎样，谈到以人的名字去命名时代（即某个人名拥有足够的影响力，能够代表整个时代的知识价值），如果以默顿的命名标准为参考，那么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可以享此殊荣，而且他们全都是男性。

牛顿、达尔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凯恩斯或其他“伟大的男性科学家”（Great Male Scientist）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是，他们都可以被归为“洞悉世界的男性”（The Man to get at The World）。但居里夫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无法用已有的泛泛之词来将她归类。男性科学家，无论其特质如何，在所有关于科学的众多概论中，总有一条适合用来评价他的贡献和作用。为此，男性科学家即便名不副实，也总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是，居里夫人在专为特定历史人物保留的闭环中往来穿梭，其一介女性的经历前无古人，自然难以言喻。所以，居里夫人带给我们的故事，只是她独一无二

① 法国英雄，《历史》，2000年4月，第31—39页。

② 勒米尔，《玛丽·居里传》，第203页。

③ 默顿，《马太效应》，第620页。

的个人故事，别无其他。居里夫人被形容为悲伤的玛丽·波平斯（Mary Poppins），被称为“放射性”领域的伊迪丝·皮雅芙（Edith Piaf），甚至堪比维克多·雨果笔下的柯塞特（Cosette），她的形象之厚重，足以与任何人相比较，无论是现实还是虚构的人物。只要她保持着某种形式的特质，她就无可比拟^①。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居里夫人逝世80年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明显单向度的人物形象，介乎于为人“鄙夷和膜拜”这两个模糊的区间^②。一直以来，我都在尽最大努力去反驳任何歧视居里夫人的思想逻辑。在这样的逻辑里，人们往往先入为主，首先将居里夫人视为女性，然后才把她视作人类的一员，最后才想起，她是对现代科学的境况有着深刻洞见的人。

我们有各种理由在集体意识中为玛丽·居里留下一席之地。我写这本书，绝非是想揭示一个世纪以来，大量有关居里夫人的材料中所隐藏的“真实的居里夫人形象”。首先，真实性研究一开始就是妄想，毫无希望。更重要的是，我从不认为大量关于居里夫人的材料之外还垂悬着一道帘子，它遮挡了“真实”有趣的东西。如书题所指，我所关心的，是那些真正建构（或仍将继续建构）玛丽·居里形象的著作。也就是说，我们要承认，从实验室笔记、文章、论文、专利、法律原理、广告、廉价报刊剪报和大众科普文章，到调查、百科全书、排名、传记和传记影片等，它们所留下的混乱踪迹，和任何所谓传记（甚至是科学）事实一样，一直以来都与文化建构居里夫人形象密切相关。

① 勒米尔，《玛丽·居里传（II）》（皮雅芙和柯赛特），第166页（悲伤的玛丽·波平斯）。

② 罗克，《玛丽·居里》，第276页。

本书的灵感来源非常简单。我一直对现代社会知识产权的争议地位充满好奇，本书的灵感正可以追溯至此。在此提到缘起过去的这一好奇心，我并非想要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过往用作答案来解释当下的困境，而是因为我同意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的观点：我们关于过去的论述，实则是对当下的关照，“我们可以通过论述过往，梳理我们当下生活的前后始末，找到更加准确地描述当下生活的方法”^①。

但是，当今的科学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场景？从玛丽·居里这样的人物身上，我们为何可以得出更多有关科学生活的信息？我将通过三个彼此关联的主题来回答上述问题，这也同时构成了本书的叙述结构：一是知识产权对科学和研究领域带来的影响；二是名人文化的出现及其在塑造科学家形象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三是科学信息的组织化是如何实现并构成了现代知识的基础之一的。尽管本书可以选择其他主题，但我认为，关注上述三方面内容是理解当代科学生活的核心，也是理解玛丽·居里科学生涯的关键所在。简而言之，我希望通过以并列结构来讨论这三个问题，从而能更加准确地描述“我们当下的生活”。

知识产权在整个学术界已无处不在，尽管长久以来，它在人们的意识中被认为是有悖于公开和分享的传统学术价值观。专利聚焦创新，商标专注信息，版权主要关注文化表达，三者共同构成了大学和高等教育的基准规范制度。但这只能说是形式上的基准规范制度，因为正如所有的社会关系一样，法律准则无法管控所有的地方。无固定形式的行为准则和标准仍存在于大学文化以外。然而，

^①夏平，《科学生活》，第13页。

任何科学家在开始新项目时，无论是“纯理论”范畴还是“应用”范畴，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就“三巨头”（Big Three）^①所承担的范围问题进行一番漫长的谈判——是独自承担还是联合研究。从“要么发表，要么完蛋”阶段到“要么获得专利，要么完蛋”阶段，一摞摞许可证件、商业秘密和保密协议越来越将实验室变成大学内部封闭的私属领地。

而一个多世纪以前，居里夫妇却并不这样认为，他们选择放弃镭的专利权。这颇让人觉得是个新鲜的选择，虽与目前人们对知识产权的认识想法相左，但在当时却并无不妥之处。居里夫妇的“无为”举动仍然是现代科学时间轴上的一道分水岭。他们承诺不申请专利，同时坚持“为科学而科学”的理念，这几乎为他们添上了神圣的光环。其可著称史书的态度，同样回响在数字化时代尊奉公开精神的思想浪潮中。本书第一章《“我”之嬗变：为了无私的精神》以玛丽·居里自述她与丈夫如何放弃为镭申请专利的决定开篇，进而论及居里夫人如何谨慎地游弋于自利与无私两个标准之间。居里夫人的行为是在不同的价值体系中求得并不稳定的平衡，而这成就了居里夫妇著名的科学精神。我意识到，居里夫妇两人——尤其是居里夫人——与知识产权的关系要比我之前想到的更为复杂，这为我寻找那段差不多被遗忘的历史开启了一扇门。居里夫妇发现并分离镭的时候，作为已婚妇女的玛丽·居里并未被视作法律主体。关于无法拥有财产的居里夫人，想要发现她为了知识产权可能采用了哪些对策，就必须深刻理解当时法律中的“男女有别”机制（“sexing mechanism”）是如何影响人的自主性与权威性的。

① 指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这三所著名大学。——译者注

和名人文化一样，将法律主体的建构作为本书的引子同样也是合适的，前者作为当代科学的另一面，我一直都在试图对它加以研究。表面看来，科学与名人文化似乎分属两个不同领域，其实不然。本书第二章呈现了一个学术竞技场，科学权威与名气尽管外化为不同的辞藻，但在这里都扮演着同样重要的角色。居里夫人生活的时代，大众媒体与期刊为广大读者普及科学知识，它所搭建的新平台成就了那些已经研究成果丰硕的知名科学家。而今，超级学术明星的产生源自大量技术与社会媒体的结合，大学与科学家成为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捆绑品牌。我们不仅视科学家的名字为真理的保证，还将其视为带有商标的商品，由此，我们接触到了名誉与名气这样的范畴。无数档差异不大的电视真人秀节目，如《老大哥》（*Big Brother*）或《单身女郎》（*The Bachelorette*），赋予了“为成名而成名”这一格言以新意。我们一般很难发现信奉此格言的科学家，一直以来它只与好莱坞演员、运动明星及政治家们的起起落落相关。但居里夫人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则是例外，两位科学家都与名人文化密切相关，——爱因斯坦是《福布斯》已故名人年度富豪排名榜上的常客^①。尽管在2013年，爱因斯坦在名气排名中远远落后于排名第一的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但仍为拥有其知识产权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揽入了1000万美元的可观收入。

尽管居里夫人没有进入《福布斯》的这一名单，在商业影响力方面与爱因斯坦相比也难以望其项背，但她几乎是在与皮埃尔·居

^① 桃乐茜·波梅兰茨（Dorothy Pomerantz），《迈克尔·杰克逊高居已故名人年度富豪榜榜首》（*Michael Jackson Leads Our List of the Top-Earning Dead Celebrities*），《福布斯》（*Forbes*），2013年10月23日。<http://www.forbes.com/sites/dorothypomerantz/2013/10/23/michael-jackson-leads-our-list-of-the-top-earning-dead-celebrities/> [2014年1月10日]

里一起发现镭的那天起就成为了名人，直到1903年获得诺贝尔奖时，其名人地位已不可撼动。人物（*persona*）是产自文化的形象与人格，要理解居里夫人如何成为科学人物，我们只需关注财产、法律主体（*legal person*）及名人文化三者是如何相互交织的。就居里夫人而言，这三者在1911年产生了最为剧烈的反应。第二章《流言、诽谤与科学：遭遇1911》叙述了两起相互关联的事件，并在居里夫人第二次问鼎诺贝尔奖这一年将她推到了聚光灯下。“这可怕的一年”^①以居里夫人没能成为法兰西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院士开始，以四场因她而起的决斗收场。丈夫皮埃尔·居里于1906年突然离世后，居里一直寡居。当她与已婚的保罗·朗之万（*Paul Langevin*）之间的婚外情引爆公众神经时，侮辱与谩骂之声最终让九名记者与一位科学家（即朗之万）刀剑相向，为传统、荣誉及法兰西国民身份而战。在那些主导着攻击居里夫人的民族主义和右翼报刊看来，这让她似乎处在危亡的时刻：危险似乎完全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

没有观众，平凡的居里夫人就不可能成为众人皆知的人物。1911年对流言如饥似渴的公众在十年后也大都变得心胸宽广，没有谁比美国观众更懂得如何赞赏居里夫人了。她于1921年首次前往美国，目的是接受她的礼物——1克镭。其价格如何？10万美元。以2014年的标准来看，它超过了今天的100万美元。《描画者》杂志（*Delineator*）编辑米西·布朗·麦隆内（*Missy Brown Meloney*）是居里夫人的忠实拥趸，因为她策划了一次出色的活动，美国女性群体就自发筹集了足够的资金，为居里夫人购买了1克世界上最昂

① 原文为拉丁语 *annus horribilis*。——译者注

贵的材料。20年前，居里夫妇贡献了镭，而现在成百上千的美国女性便给予他们以回馈，这其中是否存在一条难以割断的链条？在本书第三章《镭与居里：未曾消逝的贡献》中，我们可以看出，居里夫妇贡献镭一事要比实际情形更为复杂。通过居里夫人与米西·布朗·麦隆内之间的往来，我们不仅可以一瞥两者之间的依存，同时还会叹服这两位女性所能驾驭的巨大关系网络及众多盟友。最终，居里夫人与麦隆内的友谊告诉我们，我们因为偏见很难意识到，科学发现常常不期而至。麦隆内的关系网络，包括个人关系和工作关系，对巩固居里夫人科学家的身份带来了不可争辩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的另一个新情况也带来了影响。居里夫人生命的最后十年，有一件事一直萦绕在她心头——她深感有必要对我们所面对的海量科学信息进行分类整理，这也是本书第三个同时也是最后一个主题。书籍、文章、会议记录及专利是科学成果之所依，当我们为之选择数据库、索引和参考书目时，我们往往感到晕头转向，而这是现代人常常遇到的困难。科学家如何找到他们需要的资料？他们自己的科研成果亦应如何通过这一系统供他人搜寻？所有这一切又如何为研究筹集资金？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人们同样感到了信息过剩的问题。在第四章《居里与国联：全世界的知识分子，联合起来！》中，居里夫人成为了“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法语：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e coopération intellectuelle, CICI）成员。通过考察该委员会重点关注的两个主题——文献学和科学产权，我们发现，如今人们所熟悉的现代信息组织顺序，其轮廓在当时就已然形成。由于居里夫人一直致力于“纯理论”科学研究，且通过公开出版发扬无私的精神，所以她全身心地投入该委员会有关文献学和国际信息共享的工作才有迹可循。在这一事业上，居里夫

人与两位具备远见卓识的比利时人——保罗·奥特莱（Paul Otlet, 1868—1944）和亨利·拉封丹（Henri La Fontaine, 1853—1943）不谋而合，这两位要比同时期的所有人都更热衷于探寻文献学与科学的交叠。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提出的有关科学产权的建议引发了极大争议，而且从未最终施行，但居里会为之积极奔走，这更是未曾预料的事。

四段历史，即一个决定、五场决斗、一次美国之行和一个委员会，分别激发了本书四个章节的创作灵感。在后记中，我希望能综述过去与现在的联系，尤其是那些与本书内容相关的特殊联系。在得出最终的结论之前，我将追溯居里夫人跨越两个世纪和一场世界大战的科学生涯，研究名人文化的出现，总结国际科学信息管理的相关工作。我希望这样一段探索之旅不仅能从整体上呈现出玛丽·居里的形象是如何建构的，还能通过各种微观视角反映出整个现代科学体系的建构过程。

目录

Contents

序言 / 001

第一章 “我”的嬗变：为了无私的精神 / 001

第二章 流言、诽谤与科学：遭遇1911 / 040

第三章 镭与居里：未曾消逝的贡献 / 081

第四章 居里夫人与国联：全世界的知识分子，联合起来！ / 124

后记 / 166

致谢 / 192

文献综述 / 197

索引 / 244

第一章

“我”的嬗变：为了无私的精神

“在科学领域，我们应当对事物，而不是对人感兴趣。”^①这是你会从玛丽·居里那里听到的话。艾芙·居里（Eve Curie）说，她的母亲会用这样一句意义宽泛的话，去应付那些为一己私利过分打探居里夫人隐私的记者们。尽管玛丽·居里斥责记者们没有认清什么才是他们真正应该关注的焦点，但她比大多数人都清楚，科学如果不关乎人，那就什么都不是了。所以，当1920年有人请她为已故的丈夫皮埃尔作传、为“伟大的法国人”（法语：Les Grands Hommes de France）书系著书时^②，作为一名国际名人的多年经历教会她两件事。首先，她的出面可以提升丈夫皮埃尔的名人地位，让他能够跻身于笛卡儿、塔列朗和拉辛之列^③。其次，那句精辟的“关乎人而不关乎物”的说法——科学的存在整体上要比没有科学更好一些——自有其要义。也许，让世界记住丈夫的成就这点足以

①居里，《居里夫人传》，[F] 第310页，[E] 第222页。

②保罗·戈捷（Paul Gauthier）致玛丽·居里的信，1920年6月19日，NAF 18450，第72页。

③勒内·笛卡儿（法语：René Descartes，1596—1650），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及物理学家，西方现代哲学的奠基人。他创立了解析几何，首次对光的折射定律提出了理论论证，力学上发展了伽利略运动相对性的理论，同时发展了宇宙演化论、漩涡说等理论学说，是近代二元论和唯心主义理论的著名代表。夏尔·莫里斯·塔列朗（法语：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1754—1838），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人物，曾在连续六届的法国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外交大臣及总理大臣等职务。让·拉辛（法语：Jean Racine，1639—1699），法国剧作家，与高乃依和莫里哀合称17世纪最伟大的三位法国剧作家。——译者注

说服居里夫人与书商签下合同。不过，由于居里夫人与丈夫的工作和生活密不可分，她也借此机会能够以最能为人接受的形式回顾自己的遗产。通过出版书籍来处理自己的公众形象也越来越多地为科学家们所接受，而读者们也都愿意侧耳倾听来自科学家们心底的声音。亨利·诺依曼（Henry Neumann）认为，年轻人尤其需要理解“献身科学”所谓何意，他请求居里夫人授权其在为《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所编读物中收录美国版《皮埃尔·居里传》（*Pierre Curie*）节选^①。

居里夫人在这本传记中总结了丈夫的个人品格，详细地记录了他早期所取得的成就。虽然居里夫人本人也有些怀疑她能否如实记录下丈夫的童年，但无可否认，她是撰写这本书的不二人选。因此，当这次她能公开就他们夫妻两人如何看待自身工作发表言论时，她充分利用了这样少有的机会：

我们的研究开启了一场巨大的科学运动，其他国家也开展了相似的研究工作。皮埃尔·居里对所有这些尝试都持有宽容的态度。在我的同意下，他拒绝从我们的发现中获得任何物质回报。我们没有申请版权，毫无保留地公开了所有研究成果，包括提取镭的具体过程。此外，凡对此感兴趣的人请我们提供信息，我们也都如实奉上。这对镭行业有着巨大好处，使之能够首先在法国，然后在其他各国自由发展。这一行业至今仍在使用我们所提出的工艺，几乎没有什么改变^②。

①亨利·诺伊曼（Henry Neumann）致玛丽·居里的信，1924年6月19日，NAF 18459，第164页。

②居里，《皮埃尔·居里传》，[E]第111页。

居里夫人在详述其行为准则时，将科学实践置于“无偿贡献给市场”的二元框架下，分置不同的荣誉和回报体系。知识产权代表“利己”（“interested”）的视角，为的是“保持优势”（“reserve advantage”）。而选择“毫无保留地发表”（“publish without reserve”）并“不就具体细节保密”（“no detail secret”），这就是无私价值观的典范。居里夫妇解开了对镭所有权的桎梏，推动了——而不是限制了——科学界及镭工业更多的创新活动。镭工业从而“能够首先在法国，然后在其他各国自由发展”。我们面对的似乎是一份有关镭的发现及放射性科学的遗嘱，其主旨正是居里夫人希望留下的科学遗产，不考虑物质回报地将科学发现毫不保留地公开发表。工业应用中没有任何谁保留优势，也没有任何细节受到保密，信息可以随意获取。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居里夫人在此种情形下提到“没有申请版权”略显古怪。这可能是两位美国译者夏洛特及弗农·凯洛格（Charlotte and Vernon Kellogg）所犯的一个错误，因为尽管美国当时已经存在登记版权（copyright）的说法，但最初的法语文本指的应该是“专利”（patents，法语原文为brevets）一词，



皮埃尔和玛丽·居里夫妇漫画，参照《名利场》（Vanity Fair），1904年12月22日。本图片已获巴黎居里博物馆（居里和约里奥—居里协会）[Musée Curie, (Association Curie et Joliot-Curie)]版权许可。